

程民德： 一棵挺拔的大树(续)

汤 涛

五. 行政与管理

入党当干部

程民德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和数学所的主要领导，对北大数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决定性贡献。

程民德在《近半个世纪的回顾》里谈到：“1949年底我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书时，别无他想，只勉励自己能在祖国做个好教师。”1952年，“在填写院系调整的分配方案时，就填上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区，待到分配方案有新疆大学数学教师的名额，我即报名争取。”当1952年分配到北大后，“我也勇挑重担，除担任数学分析基础课教学任务外，还兼任数学分析教研室主任。那时我对教学改革毫无他想，就是全心全意学习苏联，因为数学在苏联是强项，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是世界一流的系。”

北大数学系前系主任、校长丁石孙回忆：“1952年院系调整，我和程民德一起来到北大。北大数学系是由三个学校的数学系合并而成的，从清华来的人数比较多。当时28个教员，只有三个党员，北大、清华、燕京各一个。党要办好数学系，必须依靠教授。程民德先生从那时起，就是数学系起较大作用的人之一。当时为了学习苏联，要成立教研室。今天大家会以为，成立教研室是一件平常的事情，但那时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教研室这个名字，谁也不知道教研室是干什么的。学校决定数学系成立一个分析教研室，作为试点，大概这个也是北京大学最早成立的一个教研室。当时分析教研室主任就是程民德先生。教研室主要要管的事情相当多，数学系的主要教学工作大多集中在这个教研室。”

由于工作积极，程民德1953年当选为北京大学所在地海淀区的首届人民



1986年11月，程民德（左二）与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（右二）、前校长张龙翔（右一）应邀访问日本九州大学

代表。1950年代中期一批品学兼优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，周培源、程民德先生也在其列。王选记得程民德入党的会议是晚上在哲学楼的大教室内举行的，主持人是当时的系总支书记林建祥，先由程介绍自己的历史，后由入党介绍人吴文达作审查报告，再投票表决。这次会议领导很重视，主持北大日常工作的党委书记江隆基副校长出席了会议，也邀请了一些学生干部参加。

1956年以后，程民德担任了副系主任。因为他身体比较好，系里的很多工作是他做的。学校也很重视数学系有这样一个干部。1960年代，程民德又参加了系总支的工作，“文革”前程民德任数学力学系代理党总支书记。

作为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教授，自愿承担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，确实很不容易。

作为学术带头人，他对北大数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。1955年中国科学院提出建立计算数学学科，要北大培养相关专业人才。程民德马上从分析教研室抽调骨干，建立计算机实验室，支持从美国回来的董铁宝设计计算机的新构思。

力学方向在院系调整时，系一级基本无人分管。后来程民德主动承担，一段时间内他花了很多时间，研究学科方向的建立与干部的培养。他是北大数力学专业最早的设计者。

1950年代末，程民德还指导学生去发射火箭！在《一棵挺拔的大树——程民德先生纪念文集》中，有一篇黄文奇的文章：“大约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10月，程先生领导一个由二十余名师生员工组成的火箭试射与研制小组。我有幸成为这个小组中年纪最小的成员。经过程先生的指导与大家的努力，我们

最终于某一个深夜，在昌黎县的山区接近海滩的地方，将一枚火箭射上了天空。”

1958年，开国上将吕正操的夫人刘沙出任北大数学系党总支书记。刘本身也是一位老干部，在北平上高中时参加了一二·九学生救亡运动，1941年在黄敬(俞启威)介绍下和吕正操相识。注意到黄敬是北大数学系1935级学生，刘沙后来到北大数学系工作也许与此有点关联。可是，听北大数学系的老人说，这位老干部对知识分子非常厉害，似乎不得人心。文革前，她生病离职，程民德成为数学系代理总支书记。

但好景不长，程民德很快成为了被批斗对象。

受迫害

1966年5月下旬，北大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攻击北大领导陆平、彭佩云的大字报，在北大引起了轰动。

程民德时任北大数学力学系副主任兼代理党总支书记，在昌平的北大200号工作，这是北大当时的一个分校。为了贯彻当时北大党委关于阻止200号同学回本校看大字报的指示，程民德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劝阻工作。1966年6月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，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称为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，文化大革命就此爆发。由于程曾阻止过同学回校看大字报，于是被理所当然地打成首批“黑帮”。

程民德的二儿子程卫平清楚记得6月初的一天，他父亲匆匆赶回家中，收



文革时北京大学铺天盖地的大字报



北京大学江西鲤鱼洲分校旧址

拾好几件衣物之后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严肃地说：“我已被隔离审查，马上要到学校集中，你们要与我划清界限，站稳立场，好自为之。”说完便急匆匆地走了。

接踵而来的就是批斗、抄家，上门贴大字报。程卫平曾亲眼目睹过一次他父亲被批斗的场景。那是在北大的学生宿舍区，程民德和许多“黑帮”站在“斗鬼台”上，手里举着标有其名字的木牌，台下口号声此起彼伏，程民德全身汗流浹背，样子很惨。那时在中关园凡是门上被贴了大字报的住户，社会上的红卫兵都可以进去随意抄家。如果说大学生抄家还只对书籍、信件等文字材料感兴趣，那么中学生抄家就是“鬼子进庄”式的了。程卫平清楚地记得他家被某中学红卫兵抄过的场景：桌椅板凳全被掀翻，箱子柜子悉数打开，他父亲的西服、领带和母亲的旗袍全被剪烂，他父亲的皮鞋也被剃成两半，家里的瓷器、花瓶、镜框和外国友人送给他母亲的香水等等全被打碎，地上堆积的破损杂物足有半尺厚。开始程家的老阿姨还尽力收拾一下，可没等收拾完，下一批红卫兵又接着来造反，留下的又是一片狼藉。

文革后成为程民德研究生的彭立中回忆说：1969年秋，工宣队进校后搞清理阶级队伍，程先生因为所谓历史问题被办学习班，当时的学习班分为“死班”和“活班”两种，后者晚上可以回家，前者则必须日夜监控，不能回家。程先生在“死班”。工宣队指派我和另一位同学监控程先生。每天夜里，上半夜一个人，下半夜一个人，轮流值班……这给了我一个特殊的机会与程先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。有一天晚上“审问”回来，我问他到底是什么问题，他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，我说那是好事，他说那个部队属于国民党的杂牌军。

当然了，国民党的游击队，还是杂牌军，那个时候被关进“死班”也不足

为奇了。

“学习班”办了一个多月才结束。后来又是整党。彭立中又见到程民德，劝他早日总结思想早日过关，他点头称是。

1969年大搞战备疏散，北大数学系去了江西鲤鱼洲干校，程民德就随着大队伍来到江西。二儿子程卫平奔赴陕北插队，家里只剩下夫人和残疾的大儿子相依为命。

坐落在南昌市东郊、鄱阳湖畔的鲤鱼洲，是原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的所在地，为中国最大的五七干校。六十年代后期，北大、清华也在鲤鱼洲办了分校、实验农场，许多老教授、老学者及新北大人在这里脱胎换骨地劳动锻炼。在鲤鱼洲干校，程民德喂牛，和牛住在一起。廖山涛养猪，姜伯驹和郭仲衡做馒头。这几位后来都是中科院院士。

据去过鲤鱼洲的老人们说，程民德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，当时的年轻教师林源渠承认比不过他。不过这里林源渠可能有谦虚的因素，他曾教过我们数学系80级泛函分析，传说他年轻时身体特别好，在鲤鱼洲干活时谁也干不过他，插秧飞快，因此得到过一个美称“三猛”，即“猛吃、猛睡、猛干”。

张恭庆回忆说，他们当时三十岁左右，主要是插秧，大家很多人在一起。经常看到当时已经年过半百的程民德牵着牛，带着草帽，去割草，基本上是一个人，晚上也是和牛在一起。大家看到他也不敢打招呼，有时只能眼神交流一下。

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戴济冠在《沉默的牛倌》里长篇描述了程民德的那段故事。因为栩栩如生，特摘录如下：

牛倌程民德，当时五十岁上下，看起来已进入老年，说是照顾他年迈体弱，让他驻守牛棚。

程民德圆脸盘、小眼睛，神色凝重，他不紧不慢、忙前忙后给牛喂料、擦身，打扫卫生。他十分勤劳认真，一如研究数学那样一丝不苟，可是牛棚里一直弥漫着浓烈的腥臊味，他的小木板床就搭在牛栏旁，想是久居其内，不闻其臭了。

我与程牛倌同在于校两年，我们从没交谈过，上干校前，我也没跟他说过话，这并不奇怪，因为我从小对数字十分弱智，放在办公室的讲义，在我眼里全是天书，那些课程名称我都看不懂，更不指望弄明白其中奥妙了。况且教授们惜时如金，我们之间无话可聊。在于校就不同了，都干着与数学不相干的活儿；同一个连队的宿舍总共几个草棚，牛棚猪圈鸡舍都在近旁，我那淘气的儿子爱去骑牛背、帮喂猪、捡鸡蛋，我时不时得去牲口棚找他，也就不难见到程牛倌面无表情地在忙忙碌碌，他从不跟我讲我的儿子有没有捣乱或帮忙，也从不表示欢迎或讨厌，我也从不跟他打声招呼，总是叫了儿子就走，有时儿子没在那儿，他依然沉默无语，我也不问他什么，扭身转往别处寻找。

程民德似乎常年穿着同一件黑不溜秋的衣服，他像老牛一样闷闷地待在牛棚里，我想，这个冷漠、呆板的人，侍弄的老牛、小牛确是肥了、壮了，他自己，显然瘦了、黑了、老了。

那天早上，食堂里传出喜讯——凌晨，一头母牛生了小牛，平时少有人关注的牛倌，午饭时，引起了难得的议论：程民德这老头真不容易，还会替牛接



原北大干校遗留的老屋

生；每夜起来几次，喂夜草，一直没睡囫圇觉，白天又不补觉，比谁都辛苦……

开晚饭了，儿子还不来食堂，我去牛棚，见他蹲在地上看小牛吃奶，程民德端了一大盆稀饭过来，儿子告诉我：“妈，这是专为牛妈妈熬的粥。给它增加营养。”我一眼瞅见程民德衣服上血迹斑斑，不由得想：“这个头脑里装满数字的人，居然会替牛接生了，够难为他的了！不经意间我瞥见程民德注视母牛、小牛的目光是那么温柔，面容是那么慈祥。我怦然心动：他不是呆板，冷漠的人。他分明是个充满爱心的老汉！”

程民德在江西干校整整度过了两年的劳动生涯。

关于北大和清华江西干校被撤销的原因，有一种说法。虽然干校刚开始一两年的，但有不少“学员”不幸染上血吸虫病。因此，正在干校劳动的一些人斗胆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，请求把他们永久留下来，不要再轮换第二批教职员了，以免后来的人再成为血吸虫病的受害者。正是这一悲壮的举动，让周恩来大为震惊，立即批示，将在干校劳动的教职员全部撤回北京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程民德的冤案彻底平反。

程卫平记得那是冬至前后的一个下午，他父亲用自行车驮回两大提包物品。晚饭后，程民德当着全家人面把那些物品一股脑全倒在火炉旁。原来那是他被隔离时写的交代材料和文革时被抄走的物品。程民德首先把所有的交代材料填入火炉。随后，他拿起一沓信纸对儿子说：“你看看你妈妈有多蠢，他把我在留学期间写给她的所有信件都保留了下来，让专案组可抓住我的把柄了。”“什么把柄？”我好奇地问道。“还不是一些解放前的称呼，比如，蒋总统、李代总统、胡适校长、民国政府什么的，只要信上有这些内容，就都被专案组用红笔勾出，

让我交代当时的动机和立场。我真是百口莫辩啊。”程民德忿忿地说道。

程卫平随意拿起一封信件翻看。那是一种特殊的不含信纸的信件，信的内容就写在信封的背面，信写好后，按虚线折叠好就成为一封信。这种信件重量很轻，属最便宜的航空邮件。程民德为了在有限空间写下尽可能多的内容，信件是用最细的钢笔，用蝇头小楷写成。儿子正看得上瘾，父亲一把将信夺走，扔进了炉膛。就这样，程民德一边责怪着夫人，一边把她充满深情保存的所有信件付之一炬。接着，程民德又把留美带回的一些证书、相册、照片等物品统统塞进炉子。

那天晚上，程家洋铁炉子的外壳有几处都被烧红了，室内温度比平时起码提高了五度。

程卫平说：“当时父亲这样做似乎要彻底销毁罪证，同过去的历史彻底告别，但是，历史是可以烧掉的吗？妻子对丈夫的恩爱和思念是可以烧掉的吗？父亲当年真是做了一件大蠢事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文革造的孽。”

老骥伏枥

文革一结束，已届 60 的程民德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。

程民德的第一个工作重心，是和江泽涵、段学复等老先生一起重新振兴北大数学系。

文革刚结束时，整个工作全乱了，教学和科研都需要重新安排，重新规划。当时摆在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，如何确立数学系的发展框架。

时任数学系领导的丁石孙回忆：“我记得很清楚，程民德先生极力坚持要成立数学研究所，而且他自己当所长。”

1978 年，程民德敏锐地捕捉到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带来的科技发展机遇，提出建立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，当时北大还没有一个研究所，此举改变了解放后数学系乃至全校没有科研体制的局面。数学研究所是程民德坚持了两年之后，1980 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。程民德本人于 1980 年至 1988 年出任数学所所长。

三十多年来，数学研究所为数学系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数学研究所支持并组织多种形式的国际、国内学术研讨会，邀请国内外著名数学家前来讲学，开办数学前沿讲座。国际上许多知名学者教授，国内一些崭露头角的数学工作者都曾在数学所作过精彩报告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数学所建立了一项制度：即研究所人员两年轮换一次，将部分活跃在教学科研一线的教师（特别是青年教师）适时地换到研究所工作，使他们在繁忙的教学任务之外，能有一段时间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工作。这对人才培养和提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

1980 年代，中国申请到第二批世界银行贷款，用于建立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。程民德又一次不失时机地几经周折争取到这笔贷款，在北大数学系成立了数学及其应用实验室，1994 年该室成功转为教育部直属的开放实验室。

除了科研，程民德对教学也非常关心。特别是 1990 年代初，一股商品经济大潮席卷全国，基础研究遭到冷遇，作为“基础的基础”的数学更是首当其冲。有一年，报考数学系的学生分数急剧下降，学校打算缩减数学系的招生指



左起：陈省身夫妇、江泽涵、程民德

标。得到这一严峻的消息后，当时已经接任数学所所长的张恭庆急忙去找程民德商量。程民德坚定地认为：“数学对国家经济建设、科学发展非常重要，绝不要因暂时出现的现象做出错误决策。”他们立刻决定一方面放下长期的“老大”架子，派教师到中学去宣传数学的重要性；另一方面，他们紧急约见学校负责



程民德夫妇（左三、右一）在家设宴招待参加“陈省身项目”的麻省理工学院 Bennet 教授（左一）、杜克大学的 Bryant 教授（右二）



左起：陈省身、廖山涛、程民德、谷超豪参加 1986 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

人，争取打消校领导减少数学招生的念头。程民德以他丰富的办学经验向校方陈述利害，取得理想的效果。

张恭庆回忆：“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，一位七十几岁的、已经不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的老人，冒着严寒骑着车去到办公楼找校领导谈招生问题。这情景怎能不令人感动！”

曾任北大数学系系主任和北大校长的丁石孙指出：“数学系能有今天，有今天的教师队伍，有今天的好风气，程民德先生作为一个系领导，他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。”

程民德的第二个工作重心，是以全国大局为重，为全国的数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。

1980年，被国内数学界称为与世界接轨的第一扇门——中国第一届“双微”（微分几何、微分方程）国际讨论会在陈省身先生的倡议与领导下，在北京大学召开了。许多著名数学家云集北京。程民德不仅参与了倡议，而且还是主要的组织者。其后，“双微”会议在多校轮流主办，程民德每次都是实际组织者，对提高我国的数学水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

1984年，在陈省身先生倡导下，第一期“全国数学研究生暑期学习中心”在北大开学，十几位海内外著名数学家亲临施教。四个星期的课让学子们眼界大开。此后研究生暑期班每年在多校轮流举办一期，程民德亲自负责，一共举办了十期。人们把它誉为数学界的“黄埔”。1995年，当时的国家教委在总结暑期中心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，设立了全国数学研究生暑期学校，程民德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。